

从口述历史看萧山百年“农地”关系嬗变

■周东华 肖涵

从衙前农民运动到钱塘江围垦

20世纪初萧山农村“地少农穷”。1920年1月1日,早期中共党员沈定一在《除夕》中写道,“富家日日吃年夜饭。若说柴米油盐一切陈债都要还?穷人日日过年关。富人只愁有得吃,穷人只想免得逼。逼的只管逼!吃的只管吃!一年三百六十日,究竟那天算除夕。”1921年7月,红船起航。40多天以后,萧山就爆发了中共领导的衙前农民运动。在百年后的调研中,当地的农民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是非常澎湃。

我曾经听老一辈的人说沈定一帮助他们减轻农民的租钱,搞农民起义。衙前农民运动的时候,老百姓都欢迎他。(庞连海,采访于2020年8月1日)

沈定一设立了农民协会,在衙前一带推动农民开展了减租运动,但他并没有直接和地主做斗争。之前土地的收成是地主和租佃户五五分,农民减租后是25%归属地主,75%归属租佃户,增加了农民收入。(庞友生,采访于2020年8月2日)

村里的大户人家周家的女儿是沈定一的大老婆,在农民运动的时候沈定一不但散了自己的家产,还革了岳丈家的‘命’,连家里的保姆婆婆都辞退了。(庞阿仙,采访于2020年8月4日)

历时4个月的衙前农民运动极大地影响了萧绍平原,80多个村成立了农协协会,领导农民开展了抗租减租斗争,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决议称“1921年,萧山农民正式组织农协协会,以反抗地主,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大革命失败后,萧山农民运动陷入了沉寂。1928年,中共农民党员钟阿马带领农民组织“铁血团”,发动“砍竹暴动”,成为农民运动的延续。

1950年毛泽东批准中央《关于在各级人民政府内设土改委员会和组织各级农协直接土改运动的指示》,有序开展土改运动,实行农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

等到解放之后,我们村子进行了土改。由于我们家以前在地主家租田种,因而分得土地一亩三分,如果没有田种的人家分得一亩一分四。(俞志桥,采访于2020年8月13日)

那个时候的土地实际上还是归农民自己,一直到之后正式有生产队,才有小队长、算工分。(泮祖木,采访于2020年8月1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萧山人民在治江的同时,在钱塘江筑堤围垦,创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谓的“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围垦是那个时代萧山人所特有的回忆,影响着那个年代的所有萧山人。

我第一次参加围垦的时候20岁都不到,

导读

百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萧山提出发动农民,用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开展了衙前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萧山又继续用土地改革和围垦的方式,初步解决了“地少农穷”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受土地有限制约的萧山农民,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在农闲时从事萧山花边、土纸生产等副业生产。尝到甜头的“先富”村,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创办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是要我们到龙湖村去挑泥,那时候围垦我们都是走路去的,走到新湾有50多里路。在那里,我们每天都要挑完一定的量,挑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但是我们不能在那里过夜,还是要赶回家,所以我觉得围垦的日子非常的苦。(庞连海,采访于2020年8月4日)

围垦时,我们就住在靠近钱塘江边的龙湖村,要自己带去铁耙和扁担,夏天时还要带好蚊帐。随着线路变远,我们后来需要带着石头来压住沙子,防止沙子被水冲走,一次单趟要走12里路,而且这个路很难走,正常的走两步路在那里只能算一步路,我们要走近两个钟头才能到达目的地。(庞祖贤,采访于2020年8月4日)

围垦给萧山人带来了新土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压力,同时,在钱塘江河口萧山段,巍巍大堤有效减少水患威胁。“堤外浪滚滚,堤内金粮仓”展示了萧山围垦事业对农业带来的巨大贡献。

从乡镇企业到民营经济

萧山形成了各村各有的特色产业,如萧山花边、土纸生产等,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的产业模式,推动了村社的经济发展。萧山花边最早来源于意大利威尼斯,因此开始也被称为威尼斯花边,俗称万缕丝,是抽丝行业中的瑰宝。1919年8月,上海商人携四人坎山教农民挑花边,风升村由此成为萧山花边的传承地。

当时风升村的花边厂会向村民发放材料花边,还有线啊这些东西,当时花边的图案多是花。工具有粗线、中线、细线,针法有很多,如穿线,芒眼,花三针等等。(杨美芬,采访于2020年8月1日)

那时候一个女孩子,10多岁的时候就要学做毛线花的。我从十一岁开始就做花边。我们做花边,一开始做毛线花(细花),后来是做纸花。做花一天赚不到一元,一张花可以卖二元到三元左右。(沈小毛,采访于2020年8月2日)

花边的制作,先以绣引引线,手工挑织

而成。色泽素雅,精致结实,产品有窗帘、床罩、披肩等,出口国外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沈村、下门村中人利用本地的毛竹资源,因地制宜的发展土纸生产,开始搞副业。土纸也参与做过,土法造纸就是先把青竹砍下,一段段斩开,烧熟,之后有人蘸料这些步骤。土法造纸还是集体经济的时候。(俞煊标,采访于2020年8月9日)

我的爷爷和爸爸都会做土纸,制作土纸的技艺的传授一般是父辈传授。做土纸是阶段性的,农忙时不做,农闲时生产。早上四点就要起床做纸,炒纸的人要起的更早,一般要做到晚上十一点。炒纸是要用到砖瓦制的别笼,把半成品放进别笼烘干。(沈亚祥,采访于2020年8月12日)

多数集体化村庄根据村庄实际情况进行了多种经营,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我们村子在1981年办起了瓦楞纸厂,我当时是做瓦楞纸厂的副厂长和供销社厂长。而且瓦楞纸厂也给村子里提供很多的就业岗位,基本上全村的妇女都来瓦楞纸厂工作,当时下墙门村的小伙子非常吃香,因为嫁到这里来马上就会有工作,而且工资待遇什么的都很好。(俞子荣,采访于2020年8月16日)

我是1999年开始办企业,叫杭州韵天织造厂。那时企业是挂在村的名下的,在村里的一个老厂房里办。凤凰的办厂环境是很好的,不光村里的干部很支持,百姓也很支持。可以说浙前整体办企业环境是很优越的,我当初企业发展厂房有困难,村里干部也都及时解决了。(陆惠祥,采访于2020年8月13日)

民营经济的蓬勃势头一直是浙江长期为人称道的地方,而萧山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超15%,如此强劲势头,究其原因还是民营企业在背后的强烈支撑。

从土地污染到美丽乡村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多,污染问题一直都存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无论是村民、工厂员工

昔日红极一时的“显学”——太平天国史,在今日渐渐淡出史学研究的舞台中心。但在这样的相对冷淡环境更能让学者静心思考其中不为人知的一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晨的《太平天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论著。本书研究太平天国的基层历史,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过往研究的空白。这部论著恰恰恰是用扎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以及精密的考证来将诸多感性层面的认识提升到理性层面的高度。正如作者在绪论所言:“传统上,民众响应和支持太平天国被认定为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主流。要与此商榷,必须研究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对立层面。否则便无法全面认知太平天国在瞬间烟消云散,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源。”

研究范围与研究问题

通览全书后,深感本书最难处理的便是它的范围确定与概念界说。太平天国自占据南京到攻占苏浙期间,除了少数关键据点外,其统治区是极不稳定的。江西、湖北、安徽等诸多地区长期陷入清军与太平军的拉锯战,太平天国在这些地方始终未能建立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更谈不上建立系统的地方基层管理体制。具体到反对太平天国的民众运动而言,在太平天国统治前后十多年中,其统治区内各种对抗性的民变层出不穷:既有政治上的立场对立,也有经济上的利益冲突,甚至还有文化上的针锋相对。这就使研究者近乎无从下手。因为如此错综复杂的内容对应的却是异常庞杂的史料,其历史脉络之多、篇章结构之大远非一本论著可以完成,而且要想在如此庞杂的事件中寻觅出简洁的历史线索并得出简明扼要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

正因如此,作者首先就规定了研究范围,这是该著能够成功的关键。论文虽名为“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研究”,但是仔细阅读,似乎更可以命名为“太平天国后期统治区民变研究”,即从经济因素入手,着眼于太平天国攻占苏浙后产生的民变问题。“研究区域:偏重于太平天国建立较稳定统治并有效推行各项政策方略的地区——江南;研究时段:瞩目于太平天国的后期;研究对象:框定于主要由经济肇因,带有自发性、突发性,特别是与清政府或清军没有直接组织联系的民变类别。”如此一来,研究范围就空前缩小,使得课题具有可操作性。

另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便是作者对一

系列概念的界定,这是该著能够成功的另一关键因素。作者在绪论中专门开辟一节“概念界说”,对“民众”“民变”“民团”“江南”“土绅”进行细化界定。

作者虽然研究的是太平天国统治区中的民变问题,但他却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具有相当宏观的社会史视野。该书重点探究的有五大问题:一、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成因、表现及影响;二、太平天国失败的社会因素;三、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历史地位;四、民众与革命的关系;五、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总的来看,前三个问题关系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成败的深

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力作

——《太平天国社会史》读后

■丁国宗

层原因,而后两个问题则极具现实意义。

聚焦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在具体研究上,作者从时序数量、地域分布、人员构成、民变成因、调控应对等五个方面着手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结论,并对过往的传统观点提出独树一帜的认识。

在时序数量一章中,作者通过系统分析太平天国辖区70起民众自发的集体行动,得出的结论是:1860年代是民变频发的时代;1861年则达到了顶峰。作者重新解释了传统论著大为表彰的“着佃交粮”问题,揭示了太平天国区域粮食租佃并交的事实。在他看来,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民变,正是因为借助传统地方实力派(如乡绅、胥吏)进行了传统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导致了民众的心理落差,并且出现了“过度干涉租佃事务和业佃关系的误差”。

在地域分布一章中,针对苏南和浙江之间差异,作者分析背后的因素为“这与太平天国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干预介入程度有关”。简单而言,太平天国在苏南统治较为巩固,以恢复传统经济模式为主,民众运动仍然是以反对征敛为主的传统形式民变;但在浙江统治尚不稳固。

在人员构成这一章中,作者则重点突出了太平天国统治区民变领导者与传统时代民变领导

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太平天国时期,知识分子参与民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士阶层纷纷加入反抗群体。但作者反对孔飞力先生所提出的绅权扩张说,反而从另外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重新解释:“一方面他们在传统地方社会事务中掌握主动权,领导民众运动是他们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权力被压缩或形成利益冲突,绅士才被迫出面抗争,绅士抗争的目的是维护既得利益或要求合理权益,权力展现和扩张不是第一位;但绅士主动领导地方军事武装,造成地方军事化,影响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控制,则属另类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太平

后天性和心理因素等三大层面。通过太平天国内部民变因素的深入研究,作者一反过往太平天国中衰于天京事变的定论,而将转折点定于标志性的1860年,从而得出了“太平天国在挫折中发展而又在发展中倾塌”的新论。

关于民众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作者大胆地质疑传统学说,即农民天生具有“革命性”的特点,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农民对革命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面相,“所谓农民天生的‘革命性’大多是在后天激发出来的。农民参加革命还要考虑农民阶层的主观愿望,两者之间的利益未必完全协同一致,应辩证地看待被裹挟进革命浪

潮的农民的命运。”太平天国虽然也有部分对农民利益的关照,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并未真正深入持续地关注农民,因此没有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造成农民阶层的分化”。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则需要从民变成因和太平天国政府应变两个层面总结。其可取之处在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努力、推行社会战略的尝试以及地方社会事务中的“变通”原则。但太平天国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教训:首先是这场运动未能超越旧式农民运动的极限,其次是没有建立统一有力的政治权力机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失去了民心,这也是其失败的根源。

综而论之,本书用极为扎实的史料与数据考察了太平天国苏浙统治区此起彼伏的民变运动,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揭示了太平军与清军十多年的激战,太平军在六十年代之前常常得胜,但六十年代后形势便陡然逆转。其背后固然有湘淮军的加强、外国势力的干预,但是其内部失败性因素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旦丧失民心,再多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挽救天国最后覆灭的命运。

在结语部分,作者在总结前面五章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开篇五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成因可归纳为先天性、

后天性和心理因素等三大层面。通过太平天国内部民变因素的深入研究,作者一反过往太平天国中衰于天京事变的定论,而将转折点定于标志性的1860年,从而得出了“太平天国在挫折中发展而又在发展中倾塌”的新论。

关于民众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作者大胆地质疑传统学说,即农民天生具有“革命性”的特点,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农民对革命存在积极和消极的双重面相,“所谓农民天生的‘革命性’大多是在后天激发出来的。农民参加革命还要考虑农民阶层的主观愿望,两者之间的利益未必完全协同一致,应辩证地看待被裹挟进革命浪

潮的农民的命运。”太平天国虽然也有部分对农民利益的关照,但是“他们的领导者并未真正深入持续地关注农民,因此没有得到全体农民的支持,造成农民阶层的分化”。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则需要从民变成因和太平天国政府应变两个层面总结。其可取之处在于稳定社会秩序的努力、推行社会战略的尝试以及地方社会事务中的“变通”原则。但太平天国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教训:首先是这场运动未能超越旧式农民运动的极限,其次是没有建立统一有力的政治权力机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失去了民心,这也是其失败的根源。

综而论之,本书用极为扎实的史料与数据考察了太平天国苏浙统治区此起彼伏的民变运动,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揭示了太平军与清军十多年的激战,太平军在六十年代之前常常得胜,但六十年代后形势便陡然逆转。其背后固然有湘淮军的加强、外国势力的干预,但是其内部失败性因素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旦丧失民心,再多的军事胜利也不能挽救天国最后覆灭的命运。

不足之处

正如史学泰斗茅家琦先生在序言所言:“人的认识具有相对真理性,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

五四运动以后,民主和科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对民主、科学的宣传和阐释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和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时期关于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起的新启蒙运动,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特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文化运动的标帜是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白话文,提倡怀疑精神。”

1937年,张闻天召集理论工作者写成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第一次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众革命”,是“新文化运动和群众爱国运动的合流”。

1939年至1940年间,毛泽东以革命话语诠释“五四”,他以“革命运动”来包容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及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五四观的纠正。毛泽东的“五四”观,成为主导大陆理论和学术界“五四”阐释的经典范式。

1942年5月4日,《解放日报》连发几篇社论,运用新民主主义理论诠释五四运动,“没有五四运动的民族觉悟和思想解放,不彻底摧毁思想上的旧教条之束缚,要中国人民能接受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刊文《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指出:“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新生,才能使青年获得肉体与精神的解放。”1947年5月3日,毛泽东对新华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进行修改,特意加写了一段,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

194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刊文《纪念“五四”及艺术节》指出,“五四运动高喊的民主与科学,今天都有了更充实的内容:为人民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毛泽东思想。”1947年5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社论《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号召青年“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

1949年5月4日,新中国成立在即,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人民日报》多版刊登了全面介绍和评价五四方面的文章,刊发纪念五四文章达30余篇,纪念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不仅仅是奏鸣庆祝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凯旋曲,更是为中共新政建构意识形态作出重要铺垫”。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日召开。朱德代表中共中央致辞,之后董必武、吴玉章等同志相继讲话。在此形势下,五四纪念的规模、范围不断扩大,北平、杭州、东北各地以及中国留日学生等都参与到纪念活动中。

1949年5月5日,周恩来在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时指出:“三十年前中国许多能人智士,无论是改良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走的旧民主、旧科学的道路,而‘五四’以后则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但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在思想上也教育了知识分子,使科学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看问题,为‘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三民主义和北伐战争。”这段描述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于“五四运动”的性质、由来、意义和作用的经典性评价。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深化辩证发展的过程。”本书仍然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或者深化的问题。

首先是茅家琦先生所提出的研究对象问题,他认为无需介意究竟究竟是否具有明显的政治权力意识或者诉求,而且地方人士主动组织的防卫武装(即民团)同样可以纳入民众反抗太平军的案例之中。笔者认为茅先生的观点是极有道理的。许多政治性的反抗同样是民众反抗,更何况许多因太平军“打先锋”以及政治腐败导致的民变本身天然就具有政治反抗性,而不仅仅单纯是经济因素的诉求。但是笔者上文也曾分析,如果作者将民团问题与政治性因素都考虑进去,研究范围与材料就会空前扩大,因此本书主要研究经济因素所导致的民变问题。当然,这就使得政治性诉求以及民团问题变成了一个仍待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其次则是作者所强调的民变与太平天国统治深入基层程度之间的关系。他的观点是愈发深入,民变爆发愈严重;与之相对的清王朝则较少干预地方具体租佃事务,不偏不倚地充当调解人,民变相对较轻。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自然很有道理,但是将太平军统治下的浙江地区与苏南地区相对比便出现矛盾了。因为根据刘晨的研究,太平军在浙江引发的已经不是民变了,而是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换言之,太平军根本没能在此地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而苏南地区却与之不同,太平军在此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秩序。二者似乎难以比较,毕竟苏南地区国家权力渗透基层引发的是大量民变,浙江地区权力未能渗透引发大规模暴力民团。较为合适的对比应该是与清王朝同一地区不同时段或同一时段不同地区管理方式之间的对比,这样方能凸显国家权力渗透与民变问题之间关联。

最后则是文章编排问题。一些史实形成了重复,章节节都重复提及难免陷入堆砌史料的窠臼之中,给读者阅读带来不小的困惑。笔者以为,作者或许可以在案件首次出现时加以系统论述,之后的论述即可一带而过。如此一来,各章节内容相互映照,既可以节省篇幅,又可以使行文更加流畅,中心思想更加突出。当然,这些商榷性意见仅是白玉微瑕,并不妨碍本书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纵览本书的选题立意、史料应用、内容结论以及研究方法,正像茅家琦前辈评价的一样:“这本书是太平天国史领域近年来较为少见优秀研究成果,推动了太平天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新中国成立前『五四』话语的承续

■李宇